

“强信息”形塑农民政治认同的机理、困境与应对

张洋阳 叶继红

【摘 要】 信息是影响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农民政治认同须建立在对政治信息摄入、认可和同意的基础之上。伴随新技术及其应用形态涌现，农村治理正日益从依靠文本、口头传播层面的“弱信息”时代加速进入依靠网络、数字信号传播层面的“强信息”时代。“强信息”深度嵌入农村政治生活后，引发了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主体身份、场域环境和信息传播模式转变，形塑了农民单向度的信息传播、接收与思考惯性，衍生出信息“边缘人”“经济人”“休闲人”效应，造成农民的农村公共政治生活冷漠和政治认同弱化。对此，有必要从资源互动、信息增值、技术优化及功能互洽等角度出发，寻求利于农民政治认同提升的方案。

【关键词】 强信息；农民；政治认同；农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章编号】** 1002-3054(2022)04-0106-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220412

一、引言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Toffler)曾提出：“所有信息与权力息息相关，并进而与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我们逐步进入信息政治时代，这种关系会越来越深。”^[1]可见，信息和政治生活紧密关联。在当前数字社会背景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自媒体信息技术革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进程，也使得托夫勒所预言的“信息政治”时代步入到新的阶段，实现了信息传播方式从“弱”到“强”的

现代化转型，进入到“强信息”时代。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信息政治背景下，网络自媒体获得了自主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强信息”媒介被赋予了强大的公共政治功能，信息化席卷农村的速度加快，嵌入农村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农村治理的政治逻辑正在数字信息技术引导下发生着现代转变，这是“强信息”嵌入农村治理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此种模式也改变了政治信息自政治家向农民单向流动的渠道，基层信息场域成为各类权力关系的角逐场，信息阶层分化、

【收稿日期】 2021-10-14

【作者简介】 张洋阳(1992—)，女，江苏宝应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叶继红(1969—)，男，安徽合肥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苏南治理现代化决策咨询基地首席专家。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1SJA1373)——信息生产传播方式转型对公民政治认同生成的影响研究。

凝聚力下降,改变了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生成方式。^[2]农村社会发展共识性认同达成困难,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建立的高度统一的宗族政治认同逐渐瓦解,为基层政治生活的有序开展增加了不确定的风险,现代农民政治认同重构的结果也因个体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变得更加不可预期,这是“强信息”嵌入农村治理相对消极的一面。

可见,“强信息”的双刃剑效应正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我国基层社会转型。为此,对于“强信息”嵌入农村治理、重塑农民政治认同的问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但当前文献大多关注到了“弱信息”对于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影响和意义等,而对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强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转型对农民政治认同的作用缺乏必要关注。既有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当下农民政治认同形成和提升的现实需求。因此,不能再简单以“弱信息”的视角看待“强信息”进程推进下农民政治认同重构发生的新问题,而是应在农村政治生活中将信息治理与传统治理手段有机融合,通过技术改善治理,破解“强信息”进程嵌入农村政治秩序整合过程的现实困境,以“强信息”手段促进农民政治认同,最大化发挥信息技术的工具价值,提升数字社会背景下农民政治认同心理的韧性及延展性。

二、信息形塑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机理

信息是政治认同客体的符号化,其生成、传播方式的转变会决定政治认同生成的机制与效果。伴随着农村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加深,农民政治认同的孕育过程正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媒介干扰。当前农村政治生活受“弱信息”和“强信息”的交叉影响,体现为受“强信息”牵制为主,“弱信息”干预为辅。农村政治信息传播逐渐从依靠文字、语言等传统媒介,转化为依靠网络、数字信号等新兴媒介。前一种信息生产、传播模式在单次信息流动过程中承载的信息量、传播信息速

度都相对受限,而后一种模式不管在信息输送量还是速度等方面都得到显著优化,且传播成本更低、开放渠道更多。这些变化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农民政治认同主体身份转变

与“弱信息”时代相比,“强信息”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的主体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即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信息农民,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主体意识和主体关系两个维度。

1. 主体意识

在“弱信息”时代,传统农民受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影响,守旧、依赖意识较强,大多数满足于被动知晓信息,对外主动寻求并获得信息的动机与能动性不强。^[3]他们的主体思维相对僵化,分析、整合信息的能力较弱,未能形成信息即资源的观念,信息在农村中的增值效应不高。农村信息主体跨时空、跨情景的异质性信息交流不多。在政治生活中,他们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主体话语弱化甚至可以说是缺失。而在“强信息”影响下,现代传播媒介适应了农民碎片化、移动化的信息摄入倾向。农民多样化的信息需求被激发出来,已从原来的信息依附主体逐渐转化为信息自主主体,在现代信息生产传播过程中的主体融入程度更高。他们意识到了信息可以创造收益与价值,思维更加活络,拥有了多重信息选择的自主权,自由获取、过滤相关信息的自主性提高,信息灵敏度增强。

2. 主体关系

“弱信息”时代的传统农民处于相对静态的社交网络中,生存环境相对封闭。在这一环境下,他们较多依赖于农村共同体内部的信息供给,对外信息沟通不够顺畅、信息交流传播半径有限。其信息互动大多局限在血缘、地缘等固化的社会关系中。此种关系建立在互惠、互信的熟人社会机制上,具备较强的信息内聚力。而在“强信息”时代,信息传播半径被无限延长,个体均处于现代信息关系网之中,且这个网络架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流动程度更高。因

此,信息农民便不再居于农村物理时空中的固定点,他们的社交网络更加动态化、社交工具更加智能化,主体身份被多重化的信息数据库去语境化。其在网络上的交往活动不再受到现实物理空间中乡土熟人社会信息生产、传播机制的约束,而是处于一个由数字网络信号交织建构的陌生人社会当中。与此同时,多点的互联网信号传送使得农村信息资源分配更为平衡,农民的经济、社交、情感等各类信息需求通过电子网络技术支持得到了满足,他们对于农村共同体内部的信息供给依赖性降低。

(二) 农民政治认同场域环境转变

在“强信息”背景之下,除了主体身份变化,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场域环境也从物理空间迁移到了虚拟空间,进而带来了场域助推及场域透明度的转化,使得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更为充分地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农民日常化的政治认同建构及维护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1. 场域助推

在“弱信息”时代,传统农村中的信息流动缓慢,行政、宗族权威主导了农村政治生活秩序,个体获取相关政治信息需要依靠国家行政机关及其下属单位的宣传、下达,以及宗族大家在当地的渗透性影响。信息传播的内容需经过层层筛选和把关,以特定的群体为信息受众,着眼于培养整体性的政治社会认知以建立稳定的农村政治认同情感。^[4]农民的信息需求被同质化。但在“强信息”背景下,数字信息与技术相勾连并不断渗透进农村,转化成为一种“隐形助推力”影响农村的现代转型发展。微信、微博等媒介创新了基层信息的交互渠道,打破了行政、宗族区域之间的信息边界。人机互动成为主要的信息交换方式,面对面的交流方式逐步被网络聊天等不见面的交流方式所替代。专业化的信息媒介能够满足农村大众的普遍信息需求,也能够考虑到农民个性化的信息需要,以特定的个体为信息受众,同时兼顾规模化与差异化的信息生产。^[5]这种情况触发农民的信息认知从一元走

向多元,由个体的信息认知代替了传统群体性的信息认知,导致其政治生活中的认同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发展倾向。

2. 场域透明度

在传统的“弱信息”传播场域中,信息传播环境较差。受物理区域空间限制,存在着熟人小群体内部的信息私有化,农民群体大范围的信息共享意识不强,且经由社交小群体延伸的信息传播路径难以溯源,透明化程度低。而在“强信息”传播场域中,基于全球基础上的信息网络覆盖面拓宽,信息得以在脱域、无界的虚拟空间中自由流动,极大改善了农村的信息传播环境。农民对于信息工具的可得性提升,新媒体平台、客户端及受众均能够成为信息中转站,信息共享范围扩大。借助全网搜索、自动采集、定向追踪、分析处理、自动预警、统计报表等功能,可以对信息网络的生产和传播路径进行全程化、立体化追踪,极大提升了农村治理过程中的信息透明化程度。^[6]

(三) 农民政治认同信息传播模式转变

“强信息”在嵌入农民政治认同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信息主体身份、场域环境的变迁,而且引发了信息传播模式的转型,使得农民从信息被动接收、传播模式进入到主动接收、传播乃至自主生产模式当中。此种模式的转变有利于建构农民主动性的政治认同。

1. 传播媒介

“弱信息”传播依赖人力、广播电视、纸质文本等传统媒介,重要的政治决策及意见依靠单维度、自上而下的口耳传播、文件下达,这是一种依附于人际网络的、被动的政治信息获取模式,在此基础上容易建构出被动的政治认同。该模式下的单次信息传播量有限,不利于信息的长期存储与深度掌握。传播者上位色彩浓厚,农民不能直接与国家、社会对话,信息反馈率较低。“强信息”背景下,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传播媒介现代化转型、更新速度加快,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涌现。农民主动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显著增多，主动性的信息认知有利于消解以往被动的政治认同形成模式。并且，农民在信息传播、接收的过程中也更倾向于主动的信息积累，通过交互性、即时性的网络信息平台获得了与国家、社会直接对话的机会。对于“急难愁盼”的问题解决，农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实时的信息意见反馈与官方落实进度查询。相关政务类信息通过云盘技术存储的时间延长、容量扩大，极大方便了历时及共时形态信息的分类收藏与检索。信息与政治互相渗透的程度也因此不断加深，产生了基层政治生活的新趋向。

2. 传播效率

“弱信息”时代传播受众面狭窄、信息准确率不高，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容易导致信息失真，进而造成信息阻滞、传达异化、接收不同步等困境，使得农民对上级政治信息的理解较易存在偏差。与此同时，上级获取农民信息同样存在着信息搜集困难，下级谎报、漏报、误报等乱象频发，促使上层公共政治决策容易偏离基层实际需要，不利于提升农民对政策结果的政治认同。而在“强信息”嵌入农村治理后，农村信息供给不足、错位、乱位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上级政府获取基层信息的渠道也更为便利。现代数字媒介对于农民的信息发布、浏览、阅读模式都进行了改造，信息传播内容被编码化、系统化，融合图片、声音、视频为一体，具有了爆

炸性、交叠性、重复性传播的特征，信息传达的精准性、便捷性、同步率得以提升。且在信息中心点的网络状结构散布性影响下，由算法、新媒体技术及数字信息链构成了非线性的社会，个体的信息关系在其中实现了相对平行发展。农民获得了更为公平的信息发布、获取、沟通的机会，信息传播的主体性、能动性更加凸显。

三、“强信息”形塑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困境

从“弱信息”时代向“强信息”时代的转变过程代表了传播技术的进化性，由此带动认同主体身份、场域环境、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为巩固和提升农民自觉型、日常型、主动型的政治认同提供了新的路径突破口。然而，这些转变也为“强信息”嵌入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带来了窒碍，农民政治参与质量并未因“强信息”技术的加持得到显著改善，反而出现了“单向度人”的信息传播、接收和思考的困境，增加了基层政治生活整合难度。

(一)信息“单向度人”效应淡化农民政治认同意识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经提出了“单向度人”这一概念，即被工业社会中标准化的经济技术机制异化了的人，不具备否定性、批判性及超越性维度，对既有的秩序及制度存在着无意识的认同。^[7]事实上，在“强信息”社会当中，由于信息已经成为影响个体行为选择和干扰政治认同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出现了这样一类“信息单向度”群体。他们受“强信息”推进的负面效应影响，被技术媒介赋予了信息人格，其个体行为也被框定在数字算法规则中，最终呈现为一种单向度的政治社会人形象。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群体往往缺乏线上的公共生活锻炼与思考，对于信息的接收、传播、思考存在着较强的依赖及领受心理。因而，单向度的政治社会人形象特征在农民群体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表 1 “弱信息”与“强信息”形塑农民政治认同的对比

总体维度	具体特征	分类体现	“弱信息”	“强信息”
主体身份	传统农民→ 信息农民	主体意识	守旧、依赖	开放、共享
		主体关系	熟人关系	陌生人关系
场域环境	物理空间→ 虚拟空间	场域助推	宗族、行政	信息、技术
		场域透明度	较低	较高
信息传播模式	被动模式→ (自主模式)	传播媒介	人力、广播 电视、纸质 文本等为主	互联网、 新媒体等 为主
		传播效率	较低	较高

1. 信息传播的单向度

政治信息传播需依托于一定的技术载体。单纯从信息在农村传播的技术维度看来,存在着数字信息技术推广普及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农民个体对数字信息技术载体的接触不平衡。政治信息传播需要依靠硬件基础条件的完善,但受农民物质经济水平限制,新媒体工具在农村的运用并未得到全面普及。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民能够自主购置智能手机、电脑等网络技术工具,被“强信息”进程卷入的程度较高,而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民因条件有限无法配备符合“强信息”推进需求的技术工具,被信息传播边缘化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面,农民群体对于数字信息技术载体的接受不充分。现代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是新媒体技术,这要求受众者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基础,能够操作运用信息技术载体。这无疑对于一些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们如果不能完全适应信息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就容易被“强信息”传播进程边缘化。这些问题导致了信息只能单向度传播给经济水平、知识能力较高的农民,促使信息前端传播者与普通农民之间的信息环境不完全对称,更容易形成信息弱势农民群体的结构性锁定。上述两方面使得农村政治信息传播体量不足,农民基于政治信息全面获取基础上的政治认同建构乏力。

2. 信息接收的单向度

目前算法技术已经被广泛运用于搜索引擎、电商平台等新媒体软件当中,在立足用户需求实现信息精准推送功能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个体的信息接收面。网络媒体平台及其算法把握了信息资源的处置、管理主导权。巨大的算法信息网下,个体的身份信息、兴趣偏好、经济状况等被一览无余,通过对于网络活动痕迹的记录,可以精确描绘出用户形象,并制定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清单,实现了信息秩序在算法技术下的定义与再生产。在此过程中,用户也可以自由选择剔除不感兴趣的信息推送,农民由此享受到了

个性化的“信息定制服务”,却也失去了广泛摄取其他类别信息的机会,不自觉地陷入了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言的“信息茧房”之中,即只愿意听自己选择的信息和能够愉悦自己的信息。^[8]这就导致农民个体容易对外界信息接收形成非理性的刻板偏好与政治信息认知的偏差,产生一种“不成熟的认同”,不利于塑造他们客观、全面、理性的政治认同观。

3. 信息思考的单向度

政治类信息话语的生产和传播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需要有深度的信息思考及理性对话,但在算法裹挟下,更容易衍生出受数字技术支配的“信息喂养”模式,不利于个体独立地进行信息内化分析。尤其对于信息辨别力、创造力相对不强的农民而言,其信息思考的空间更是被进一步压缩。农民的信息思考被外界媒介整合于同一种信息认知模式当中,其做出的信息决策越来越多地依靠大数据、算法,而非来源于自身。他们会逐渐习惯于摄取不需要思考、解读的“信息快餐”,只能正向接收、输入信息,却不能有效地反向加工、输出信息,由此产生盲目的信息从众行为。同时,他们也不能够清晰地思辨并表达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需求,更热衷追求信息的热度、流行标签,满足于被动的信息积累,缺乏必要的数字权利意识。在这一情况下,深谙信息运作逻辑的“技术专家”更易于操纵网络话语,进行信息炒作。“数字霸权”“算法黑箱”等新的现代性问题由此产生,这也使得基层信息政治的公共性缺失,农民个体的政治敏锐性及政治认同感难以有效培育。

(二)信息“单向度人”效应的类型化

信息“单向度人”在不同的信息维度又可分化为不同的表现形态:在信息技术趋向维度,部分农民因技术弱势被单向度隔离于信息化潮流之外,无法参与到农村政治智慧化升级的过程中,成为现代农村信息政治“边缘人”;在信息经济趋向维度,部分农民因追求单向度的信息经济获利,忽视了以信息势能提升政治参与效能,成为

了信息“经济人”；在信息功能趋向维度，部分农民因偏好单向度的信息休闲娱乐功能，忽视信息政治功能，而成了信息“休闲人”。对这三类群体进行类型化的讨论，有利于深度剖析“单向度人”效应对于提升农民政治认同带来的现实影响，并提出应对之策以缓解“强信息”技术手段嵌入农村治理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

1. 信息“边缘人”效应出现，数字弱势农民政治认同能力欠缺

虽然信息技术以其开放性、包容性在农村中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公共舆论场所，填平了城乡之间横亘已久的信息鸿沟。但深究其背后，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信息差”依旧存在。由于数字信息技术的熟练运用具有门槛，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农村社会中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便无法享受技术带来的红利。知识能力的局限使其对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认知不充分，较多存在着“数字畏难”情况，由此出现了数字弱势农民群体——主要包括老年人口、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等。他们“对信息的真伪难辨，信息的敏感性、捕捉能力不强、理解能力不高，获取信息的报偿难以保证。”^[9]由于他们的信息利用行为效率较低，个体的信息素养不能适应信息环境的快速转变，致使这类群体“无法享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快捷和便利，也不能触及、理解和利用数字化时代的信息资源，从而成为智慧治理中被遗忘的角落。”^[10]

在上述过程中，信息技术推广的公共性价值被进一步削弱，信息技术应用层面的不公平也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公平。这使得现阶段农村信息化推动实现的只是少数群体基于信息网络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化、服务便利化，部分缺乏技术使用能力的农民只能被边缘化。尤其是一些基于网络开展的民主投票、议案提交环节基本过滤掉了这类群体，因缺少必要的信息表达与政治参与能力，其参与或是不参与农村政治生活都无法从实质上影响农村政治过程。由于在信息技术层面就存在着这种政治参与机会的不平等，信息弱势农民群

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和主动性也因此被削弱，其对政治生活会表现出冷漠或者不认同。因此，从一定意义上看来，“强信息”进程非但没有扩大公共参与、提升基层政治活跃度，“反而出现了普遍的公共领域非政治化，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和非群体化，甚至在许多方面在某些群体中出现了追求替代性社会授权(认同)的各种反社会倾向。于是它所导向的并非更广泛的民主化，而是走向互联网所代表的信息独裁。”^[11]

2. 信息“经济人”效应放大，农民政治认同行为表现冷漠

伴随着当前网络信息技术深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经济形态层出不穷，信息经济也在农村社会强势崛起。农民开始借助网络直播、电商媒体等信息化平台参与线上经济生活。在此种背景下，信息成为一种可以获利的资源，农民逐渐更多地关注和搜集有关农业生产经营、外出务工等可以实际提升自己物质生活水平的信息，而对于不能在短期内改善自己生活质量的公共政治类信息则相对不关心。市场化的个人利益观得到了更多农村社会成员的认可，个体农民基于社会发展的责任感欠缺，农村公共议题处理的共识达成率下降，共同体当中集体性的政治效能感相对弱化。由此导致部分农民的信息“经济人”属性增强，“政治人”属性弱化。这类群体往往会花费更多的心思用来经营自己的经济生活，无心参与农村公共政治活动。他们认为参与政治生活会分散其务工、赚钱的时间和精力，政治参与的成本与预期收益难以完全匹配。这也正印证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琼·纳尔逊(Joan Nelson)的总结，即“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如果个人能够通过移居都市、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或改善他们经济福利等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那么，这些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参与政治的替代物。”^[12]由此，在外界的“信息经济”吸引下，一些农民缺乏参与政治生活的兴趣，从态度及行为上表现出对于政治的不关心或疏远。传统

农村稳定性的政治认同因此遭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冲击。

3. 信息“休闲人”效应增强，农民政治认同内生驱动不足

约翰·凯利(John Kelly)曾言：“休闲取向与价值观通常与整个制度化的社会化过程相一致。这意味着休闲是政治性的，是服务于社会制度的。”^[13]从一定程度上看，休闲与政治社会化密不可分。这一点在我国改革开放前体现得尤为明显。改革开放前，农民的休闲生活具有强烈政治性、动员性色彩，全民广播操、全国乒乓球热等整齐划一的休闲活动开展，无一不是响应国家号召，休闲与政治在这一时期无法明确区分开来。^[14]休闲、政治合一使得当时的农民对于休闲生活的认同带有政治认同的附属性。但随着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推进，农村的休闲生活逐步由从属于政治的地位转变成为农民自觉价值选择的结果。“休闲”与“政治”的二分开始出现，个体自主性休闲意识觉醒。农业机械化、科技化缩短了劳作的时间，更为农民腾出了更多自主支配的休闲空间。且在信息化深度融入农村的过程中，线上与线下的娱乐休闲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农民休闲不再是唱歌、听戏等传统项目，而是进一步延伸至线上的网络冲浪。但在娱乐休闲生活得到充实的同时，农民个体深度应用、开发信息技术的社会学习技能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

由于信息技术在农村推广的过程中，“技术的术层面(即现象层面)被过度开发和利用，而技术的目的层面(即知识和价值层面)被越来越弱化”。^[15]农民个体也因此日益沉迷于信息网络的休闲娱乐功能，缺失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主动获取政治信息，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并建构自身政治认同的主动性与驱动力不足。他们获取网络信息更多是为了休闲放松，信息媒体在获知了这一需求特征后，也会出于保证平台的用户留存率目的而加大休闲类信息的推送频率。这进一步加剧了“强信息”在与农村碰撞时发生“泛休闲化”的功能固着，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对

于公共政治类信息关注的程度，导致个体的线上娱乐休闲愈加难以同线上政治融合。基层公共政治生活非但没有利用好线上信息媒介，反而被媒介用户的娱乐偏好误导，农民线上的“信息休闲”思维由此形成，信息技术无法创造和产生更多的政治生活价值。

四、“强信息”形塑农民政治认同的困境应对

一般而言，政治认同的产生、巩固与政治生活的参与、实践密不可分。然而“强信息”引导的数字社会背景下，农村信息“单向度人”效应较大规模显现，并分化出“边缘人”“经济人”及“休闲人”三种群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关心甚或不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因而无法产生强有力的政治认同。深究该现象的背后可发现，这一问题实则由来已久。早在农村“弱信息”背景下就存在着农村政治生活活力不足的情况，“强信息”的冲击使得该问题进一步暴露无遗，导致现代农民政治认同的建构相当孱弱。因此，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境，并不能简单从信息技术本身出发，过度放大“强信息”的影响，而忽视了政治认同形成的一般规律要求。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强信息”环境下重建农村公共政治生活，以有效回应农民个体化的信息政治需求，减少“强信息”过快嵌入农村治理转型带来的技术不适感。

(一) 资源互动，推动线上线下政治生活耦合

信息获取单向度、沟通交流不畅容易导致政治认同建构困难，不利于打开基层有序的政治生活局面。为有效利用好信息资源，缓解“单向度人”信息传播、接收、思考的困境，在农村当中形成数字信息技术与治理共赢的局面，需提升农村社会的信息黏性，增强线上线下的政治信息资源互动合作，将数字信息技术内嵌于农村政治生活当中，弱化“强信息”嵌入政治认同重构的负面影响。在网络化的社会关系平衡中，找到农村

线上政治生活的切入点,形成跳脱于物理空间之外的农村信息熟人聚合体,搭建不受线下场域限制的农民网络政治参与平台。

1. 信息网络赋权

在“强信息”影响下,网络技术所具有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趋势进一步凸显,政府部门可有效利用好此种优势,通过信息网络赋权推动线上和线下政治生活的互动与融合。首先,政府应鼓励农民多接触、多运用数字媒体工具,熟练了解线上政治生活参与流程,激发农民群体深度参与信息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发挥信息技术促进自主学习、交流的功能,使基层政治信息可以通过网络、手机、智慧治理平台等载体被农民有效识别并传播,有效解决信息化时代线上与线下农村政治生活耦合的困局。其次,政府应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的凝聚力,降低线下政治参与的成本,为技术治理精准对接农村政治领域,并与传统治理有机融合提供价值及思路引导,避免出现以信息技术简单代替治理,农村生活去政治化的状况。通过以上方面的努力,国家的方针政策才能够在基层更多、更快获得农民的认可及支持,农民政治认同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

2. 提供基层信息咨询与援助

为保障农民群体能够在数字技术场景下更加积极地参与农村公共政治生活,信息咨询和援助的提供必不可少。为此,基层政府需提供必要的技术环境、技术场景的服务保障,以线上线下多样化的信息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加大智慧信息治理在农村推广普及的力度。首先,加强对于基层管理者的技术业务能力培训,为技术渗透提供一系列的管理服务。打造一支信息业务能力强、素质过硬的人才服务队伍,夯实信息服务推广人员的技术基础,培养农村线下具有信息识别、搜集、加工、反馈能力的基层服务人员。^[16]其次,通过基层服务人员引导农民在群体信息交流中完善个体的政治认知,协助其达成对于政治信息的共同理解,使得农民“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可以通过在彼此尊重基础上的对话,来寻求相互

理解,甚至视域融合^[17]”以最终实现农村群体政治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或者“重叠性共识”。^[18]

(二) 信息增值,提升农村信息服务效能

“信息增值”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发挥“强信息”的正面效能、弱化负面影响,整体上提升信息惠农、数字助农的服务效果,以信息技术优化农村治理,活跃农村政治生活氛围,提升农民主动参与政治生活、建构政治认同的能力。

1. 全面提高农民个体的信息素质

农民个体的信息素养不单包括接收信息的能力,更应该包括知晓如何甄别、归类、解读、挖掘信息资源的能力。首先,通过技术下乡、教育下乡等手段培养农民基于现代信息网络进行深度学习、思考的能力。以此可带动农村政治信息知识结构的更新,进一步缩小农民在接受、解读信息过程中的个体能力差异,提升信息传递、互动质量。其次,确立农民在“强信息”社会中的主体存在感、效能感,塑造他们独立的政治人格。以此使农民能够在政治信息沟通交流中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避免信息盲从、功利主义的政治心理泛滥,强化自主建构政治认同的驱动力,使其在公共政治生活的信息交换过程中,“可以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正在发挥着正确的政治作用,从而得到一种满足感。”^[19]

2. 研发符合农村需求的信息服务系统

为将民主化、科学化的要素注入基层政治决策过程,改变科技专家、知识精英对于农村信息供给、表达和反馈的垄断地位,实现基层信息资源的优化配置,相关数字技术服务部门需降低基层信息获取、转化、运用门槛。首先,协助农民了解并认同基层信息运作的逻辑,加强个体基于数字信息深度获取基础上的信息互动能力。其次,邀请第三方组织基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面向农民的基层信息系统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他们需要评估的内容包括:数字技术推广应用的难度;是否存在歧视;是否有

损行政公平的风险。^[20]最后,在评估基础上,相关数字技术服务部门应该综合考虑信息技术的可行性、农民的认可度,权衡不同群体的信息感受,征求社会意见进行信息技术改造。改造的方向包括:不断精简数据信息操作流程,提高基层政治生活当中信息服务的可得、易用程度,维护好农民运用信息技术平台的平等性、公正性权利等,使其在信息化的政治功能导向下,可以充分享受到政治生活中的信息红利。

(三) 技术优化,增强信息政治对于农民的回应力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曾指出:“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21]伴随“强信息”时代席卷而来,政治信息技术强大的吸纳能力亦使得农民不可能置身于政治之外。但之所以农民对于政治生活认同感不高、参与兴趣不足,又和他们未能在当前的政治生活中获得足够满意的利益相关,体现为基层信息政治生活的开展对于农民切实利益需求回应力不足。为此,需提升“强信息”时代线上及线下公共政治生活对于农民切身利益的回应力,保障不同的个体、阶层都能够在繁杂的信息当中找到符合自身诉求的价值因子。

目前,结合农民群体差异化的利益诉求来看,对于一些偏远落后农村中忙于经济生活无法兼顾信息政治生活参与的群体,基层政府有必要在该类地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发展地方经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使他们不至于因忙于生计问题而忽视政治参与,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接收、关注政治信息,促进其实现从个人主义至上的“理性经济人”思维向追求集体价值的“公共政治人”思维转变。而对于一些有闲、有钱能够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的群体,政府部门应提供充足的信息参与渠道,扩大农村信息公开化、民主化效应,借助网络直播、短视频录制、政府论坛等多元化的信息交往模式,实现主流媒体与农民的信息共建,在政治信息系统环境下提供农民的信

息参与性输入,以此激发农村政治生活中潜藏的信息能量,让农民个体在政治信息充分获取、意见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内生出对于现代农村治理决策方案及其实施过程的认同。

(四) 功能互洽,促进信息政治与算法技术的融合

算法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媒体在深谙农民个体信息需求特征的基础上,偏向于强化推荐相关的娱乐休闲信息,有可能会加剧农民个体过度沉溺于信息媒体平台提供的娱乐休闲功能,容易使得技术的“算法经济理性”支配政治人的“公共理性”。由此,农民的政治理性思维能力无法得到有效锻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进行政治参与及产生认同的能力。这提醒我们,在享受“强信息”技术带来福利的同时,更要以谨慎的态度避免技术过度支配我们的政治思考及行为表达,促进基于技术手段下的信息技术功能与政治功能的有机融合,强化信息技术植入基层治理的政治根基。

1. 发挥算法技术的正当性逻辑

在“强信息”时代,算法深度影响着农民政治认同的形成过程。对此,必须建立起对算法的规范和引导机制,以发挥算法技术的正向效应。首先,政府应在“强信息”嵌入农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前置性渲染信息政治的价值导向。在此价值指引下,应该对“强信息”手段介入农村政治生活的功能及边界审慎地加以厘清和规范。其次,政府须引导媒体平台减少基于算法数据技术上的自动化决策,杜绝完全依据个人的娱乐休闲喜好推送信息,加大对于民生社会、政策法规等政治相关性信息的推送,避免信息技术运用的程式化、简单化、过度娱乐化倾向。最后,政府应该强调信息政治属性,抵制信息泛休闲化对于农村政治生活的消极影响,积极引导农民在政治信息有效摄入的基础上进行独立、理性的政治思考。在此情况下,互联网、算法等现代信息技术就不仅可以满足农民精神性、娱乐性的生活需求,还可以为其

参与农村政治生活打开全新的通道。

2. 凸显信息政治人本主义导向

信息技术在与农村政治场域融合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替代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如果一味迷恋信息技术,追求技术治理的标准化,容易变成“技术拜物教”。为此,有必要在“强信息”时代回归政治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即“以不损害社会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原则”,^[22]始终依据人的价值实现与否来判断农村信息技术应用的公共性负载。^[23]首先,基层管理者在“强信息”嵌入的基层政治生活场域中,不仅要充当事务性服务供给角色,更要充当公共性维护的角色。^[24]将涵育基层政治发展的认同度、满足人本主义需求作为农村信息供给的突破口,并结合信息技术作为基层治理的辅助工具,维护好技术的中立价值。其次,基层管理者应该反思信息供给的导向,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基层信息资源进行政治导向性配置,避免过量、过激信息载入淡化基层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及因信息溢出、供给无效反复

出现所导致的农民信息认知曲解,从而有效建构起农民的政治认同。

五、结语

“强信息”技术嵌入农民政治生活的进程具有两重性,我们有必要通过资源互动、信息增值、技术优化和功能互洽放大其对政治认同形成的正向效应,规避其负面效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紧抓“强信息”转型机遇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弱信息”媒介的当代传播价值被全然否定。若想农民政治认同得到更为彻底的稳固提升,仍需有机融合“强信息”及“弱信息”工具,既要占据线上的数字网络信息平台,又要有效规制好线下传统的信息传播平台,以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媒介提高政治信息传播效果,助力农村政治生活智慧化,全面提升农民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参与感、获得感,重构基层政治认同与政治信任。唯此,农村政治社会由“弱信息”向“强信息”时代转型过渡的相对稳定性才能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 [1] (美)A. 托夫勒著,栗旺等译. 预测与前提[M].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5.
- [2] 闫方洁. 基于传播个体主义的“交互”与“共识”——自媒体时代新型信息政治实践的双向价值及治理逻辑[J]. 新闻界,2017(10): 39-44.
- [3] 马九杰,赵永华,徐雪高. 农户传媒使用与信息获取渠道选择倾向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08(2): 58-62.
- [4] 张爱军. 后政治传播时代政治认同的特征、趋势与建构困境[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2): 69-78.
- [5] 邬建中. 基于“使用与满足”的“三网融合”推广策略[J]. 当代传播,2011(1): 89-91.
- [6] 尹培培.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分析系统[J]. 广播与电视技术,2013(7): 44-47.
- [7]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 单向度的人[M].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12.
- [8] (美)凯斯·R. 桑斯坦著,毕竞悦译.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法律出版社,2008: 8.
- [9] 徐雪高,杭丽群. 对农信息传播供需双方行为表现及其成因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71-74.
- [10] 韩志明. 技术治理的四重幻象——城市治理中的信息技术及其反思[J]. 探索与争鸣,2019(6): 48-58.
- [11] 肖峰. 当代信息技术的若干政治哲学问题[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377-382.
- [12] (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晓寿等译.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 华夏出版社,1989: 55.
- [13] (美)约翰·凯利著,赵冉译. 走向自由[M]. 云

- 南人民出版社, 2000: 233.
- [14] 刘新平. 百年时尚(1900-2000)——休闲中国[M].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 152-178.
- [15] 马卫红, 耿旭. 技术治理对现代国家治理基础的解构[J]. 探索与争鸣, 2019(6): 68-75.
- [16] 卢秀茹, 王健, 高贺梅. 提高我国农民信息素质教育水平的对策研究[J]. 高等农业教育, 2004(12): 87-89.
- [17] 童世骏. 关于“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6): 62.
- [18] 袁银传, 郭亚斐. 试论当代中国价值共识的凝聚机制[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7): 74-78.
- [19] (日)蒲岛郁夫著, 解莉莉译. 政治参与微观政治学[M].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5.
- [20] 王贵. 算法行政的兴起、挑战及法治化调适[J]. 电子政务, 2021(7): 2-14.
- [21] (美)罗伯特·达尔著, 王沪宁等译. 现代政治分析[M].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5.
- [22] 王伯鲁. 技术化时代的文化重塑[M].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125.
- [23] 王张华, 颜佳华.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行政的公共性审视——基于“人机关系”的视野[J]. 探索, 2021(4): 82-95.
- [24] 颜佳华, 王张华. 人工智能与公共管理者角色的重新定位[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6): 76-82.

The Mechanism,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trong Information” Shaping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ZHANG Yang-yang YE Ji-hong

Abstract: In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must be based on the intake, recognition and consent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With the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forms, rural governance is accelerating from the “weak information” era relying on text and oral communication to the “strong information” era relying on network and digital signal communication. After the “strong information” is deeply embedded in the rural political life, it has trigg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bject identity, field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 of the formation of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shaped the one-way inertia of farmer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ception and thinking, derived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marginal people”, “economic people” and “leisure people”, resulting in the indifference of farmers’ rural public political life and the weakening of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a scheme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interaction, information value-added, technology optimization and function consistency.

Keywords: strong information; farmers; political identity; rural governance